

## 黃宗羲詩作中「硯」之意涵探析

張耕華\*

### 摘要

歷來對於黃宗羲的研究，多著重於思想及史學。由於黃宗羲身處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時代，加上自身的操守堅持，時代背景和個人特質相互融攝，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思想和史學著作。然而劇烈動盪的局勢以及黃宗羲標舉的志向和抱負，除了會在思想或是史觀上反映，在最容易書寫志向的詩歌作品中，又會有什麼樣的手法及樣貌呈現？觀察黃宗羲的詩歌作品，可以發現述及「硯」詩歌作品，都呈現出「硯一人一史」的連結性。藉由對硯的書寫，我們除了可以了解到黃宗羲自身與友人，甚至是前代文人的關聯性，更可進而了解當時整個大時代在黃宗羲心靈上所刻下的痕跡，而其中可能更隱含了黃宗羲對當時時勢的觀點和評判。透過黃宗羲這些述及「硯」的詩作的分析，或可以歸納出黃宗羲在詩歌作品中所透顯出的觀點，以期對黃宗羲其人其詩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關鍵詞：**黃宗羲、黃宗羲詩、《南雷詩曆》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生

## 一、前言

黃宗羲（1610-1695），中國十七世紀傑出的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甚至是科學家。他博學多才、著述弘富而廣闊，舉凡經學、史學、思想、文學、天文、曆法等等各領域皆有所涉獵。然對於黃宗羲的研究，卻大多著重在思想和史學等幾個特定的領域上，對於其他領域的研究關注較少。其中，文學領域中的「詩作」便是相對受到忽視的一環。

據筆者查考<sup>1</sup>，涉及黃宗羲詩作部份的研究非常少見<sup>2</sup>，對於黃宗羲在《南雷詩曆·題辭》自稱為「按年而讀之，橫身苦趣，淋漓紙上」<sup>3</sup>的詩歌作品，實在尚待研究者深入探掘。然而由《黃宗羲全集》來看，黃宗羲的詩歌作品約近五百首，面對數量如此可觀的詩作，或許該將其作分門別類的研究，方更能深入探查黃宗羲的詩作內涵。

張高評先生在〈《南雷詩曆》與傳記詩學〉中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論點：「卷一〈讀上蔡語錄……好硯……〉、卷二〈史濱若惠洮石硯〉、〈周公謹硯〉，則以硯為史筆之化身，大有懲奸除惡捨我其誰之慨！」<sup>4</sup>筆者對此便產生了一些疑惑：「史筆」意涵為何？黃宗羲又為何以「硯」這個物件作「史筆」的化身？黃宗羲詩作中的「硯」只出現在這幾篇作品當中嗎？有沒有另外的篇章而有相同的意蘊，又或者是另一種不同的表現模式呢？

緣此種種引發了筆者的好奇，筆者因而進一步查考《黃宗羲全集》中所收錄的詩作，發現除了張高評先生提到的這幾篇作品之外，黃宗羲還有其他提及硯的詩作。加以研讀後發現，張高評先生的「史筆」之說尚有討論和說明的必要性。

<sup>1</sup> 對於黃宗羲的研究可參〈黃宗羲研究論著索引摘要（1900-2000年）〉及〈近二十年黃宗羲研究論著索引（1986-2005年）〉。分別收錄在徐定寶：《黃宗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70-388，及吳光：《黃宗羲與明清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29-368。

<sup>2</sup> 就筆者所見資料來看，台灣方面的學位論文只見《黃宗羲的詩文觀與明清之際的文學思潮》提及，專書亦只有《談藝錄》和《殘霞與心焚的夜燈如舊——代儒俠黃宗羲的「文道合一」論》稍有論述，單篇論文則未見；大陸方面專書部份惟《黃宗羲評傳》和《清代文化與浙派詩》中的一小章有所介紹，單篇論文則僅〈黃宗羲與化安山詩情——「山居詩」審美透視〉、〈洮硯叢說補遺——黃宗羲詩《史濱若惠洮石硯》詮釋〉和〈達蓬山與黃宗羲的游詩〉三篇。參黃齡瑤：《黃宗羲的詩文觀與明清之際的文學思潮》（臺中：靜宜大學中文所，2000年）；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社，1988年），〈明清人師法宋詩 桐城詩派〉，頁143-145；陳旻志：《殘霞與心焚的夜燈如舊——代儒俠黃宗羲的「文道合一」論》（臺北：萬卷樓，2002年12月），頁321-334；徐定寶：《黃宗羲評傳》，頁249-263；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二編第一章，頁56-84；華建新：〈黃宗羲與化安山詩情——「山居詩」審美透視〉，《遠程教育雜誌》第六期，2000年；吳建偉：〈洮硯叢說補遺——黃宗羲詩《史濱若惠洮石硯》詮釋〉，《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1999年；趙自：〈達蓬山與黃宗羲的游詩〉，《文匯讀書周報》，2001年。

<sup>3</sup> 《南雷詩曆·題辭》。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05。此後出現的《黃宗羲全集》皆採此版本，將僅註明冊數和頁數。

<sup>4</sup> 張高評：〈《南雷詩曆》與傳記詩學〉，《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2卷第2期（1993年12月），頁127。

筆者本文將先分析黃宗羲詩作中提及「硯」的作品；接著說明挑選「硯」的原因；再依黃宗羲本身論點和提及「硯」的作品來詮釋「史筆」意涵；最後再予以總結。希望能藉由這個特殊的切入點，深入了解黃宗羲的詩歌作品。

## 二、黃宗羲敘及「硯」之詩作釋析

黃宗羲曾為友人呂留良〈友硯堂記〉<sup>5</sup>作跋：

……亂後雲煙過眼，一時交遊亦零落為異物。余從樵人瀑布嶺下，拾土題名而已。因嘆交遊之盛衰，關於世運之升降，而研石之聚散，又關於交遊之盛衰，如李格非之記名園一例也。……<sup>6</sup>

黃宗羲將「交遊」、「時勢」和「硯臺」相連結，認為此三者關係環環相扣，知此亦可解彼也。此恰和跋中所提及的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中所作評論相似：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澗之阻；當秦瀧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丘土虛（按：最末二字為一字）；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得，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sup>7</sup>

據此看來，李格非記名園之興廢以顯洛陽之盛衰，更進一步可明天下之治亂也，則李格非的「名園—洛陽—天下」和黃宗羲的「硯臺—交遊—時勢」實有異曲同工之取向。因此，黃宗羲如何在詩作中運用「硯」這個物件便值得好好分析觀察。

黃宗羲敘及「硯」的詩作共計十三首<sup>8</sup>，依內容所記，可分成「感時傷世」、「表露心志」和「純粹記事」三個部份來討論，現分述如下：

### （一）感時傷世

黃宗羲此部份的詩作最多，共計有七首。詩作內容主要是藉由硯臺引發的聯想，抒發感時傷世的寄託懷抱。這些詩作中的硯臺或是情誼深厚的友人所贈、或是

<sup>5</sup> 呂留良的〈友硯堂記〉專記朋友所贈之硯臺。參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臺北：鐘鼎文化，1967年），卷6，頁24下。

<sup>6</sup> 〈友硯堂記跋〉，《黃宗羲全集（第11冊）》，頁78。

<sup>7</sup> 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年），頁13。

<sup>8</sup> 此數為筆者依照《黃宗羲全集》中所收之詩作統計而得。黃宗羲的詩歌作品可參《黃宗羲全集（第11冊）》，頁213-372。

歷史名人所留，因此這些硯臺除了被用來當作書寫工具之外，也同時蘊含了世代傳承的歷史意涵。現分述如下：

1、〈讀上蔡語錄。上蔡家極有好玩，後盡舍之，一好硯亦與人，慨然賦此。〉  
 有宋上蔡謝先生，一硯不留磨破瓦。要使胸中自廓然，世間何物更難捨！而  
 吾平生玩物心，擾擾無殊于野馬。忽然北風捲土去，不名一錢在屋下。突兀  
 三硯真奇物，天將史筆委之野。一硯龍尾從西士，傳之朗三宣城梅朗中傳之我。  
 燕臺瀕洞風塵中，留之文虎甬上陸符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余書室名雪交亭，治  
 亂存歿淚堪把。一硯活眼暈九重，秋水時向明窗瀉。丁子王作合玉硯，千祀  
 古文出亡社。三硯縱橫傍短檠，雪屋無烟亦瀟灑。昔年送女入甬東，穴壁偷  
 兒不相假。吾時聞之在中途，欲行不前奈兩蹀。嬌兒阿壽恐吾傷，乞得滑硯  
 強吾寫。吾寫阿壽勉強笑，握筆終然多牽惹。開卷今見上蔡事，使我愧汗如  
 盛夏，丈夫力不能自割，偷兒真為益我者！兒亡三載硯四年，有賊不向貧家  
 打。<sup>9</sup>

此詩作於順治 14 年以後、16 年以前（1657-1659）<sup>10</sup>，黃宗羲年歲在四十八歲到五十歲之間。詩題中的「上蔡」，指的是指程顥門下的謝良佐。此詩緣於讀《上蔡語錄》的觸發，由謝氏聯想到自身的遭遇。詩題的中後半部份所記之「上蔡家極有好玩，後盡舍之，一好硯亦與人，慨然賦此」，是指謝家本有許多珍奇寶玩，後盡皆捨棄，所持有的一方好硯亦贈與他人，因此引發黃宗羲的感慨而成詩。《宋史》中關於謝良佐的記載曾提及謝良佐「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sup>11</sup>；《宋元學案》亦有「坐口語下獄，廢為民」<sup>12</sup>的類似記載，則捨棄這些珍玩或和這些事件有所關聯。

詩一開始便點出謝良佐盡棄家中珍玩，用來對比黃宗羲自身奔騰的玩物心。後筆鋒突然一轉，追記曾有的三方硯臺，其中最為特殊的是一方龍尾硯。龍尾硯屬歙硯中的珍品，據《硯箋》所載：「龍尾山，古坑無石，他山皆龍尾支脉，謂之龍尾坑，延蔓百餘里，取不竭」<sup>13</sup>。此硯可謂顛沛流離，應是黃宗羲先由梅朗三處得來。梅朗三，名朗中，與黃宗羲情誼深厚。黃宗羲曾在專記師友的《思舊錄》中紀錄其人其事<sup>14</sup>。後來黃宗羲不知何故無法自己收藏，便留給了另一位好友陸符。陸符亦

<sup>9</sup> 參《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232。

<sup>10</sup> 黃宗羲《南雷詩歷》中的詩作大多按年編排，部分詩作題目下會自註年份。除了自註年份以外的詩作，或是有可參證之歷史事件，餘僅能判斷其大約的寫作時間。

<sup>11</sup> 脫脫等撰：《宋史（十）》（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卷四百二十八，列傳第一百八十七，道學二，程氏門人，頁 9951。

<sup>12</sup> 《黃宗羲全集（第 4 冊）》，頁 162。

<sup>13</sup> 高似孫《硯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子部第 149 冊，譜錄類，頁 108。

<sup>14</sup> 參《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 1 冊）》，頁 362-363。

為黃宗羲之至交，在《思舊錄》便曾言：「余之學始於眉生，成於文虎。」<sup>15</sup>。直至陸符過世，這方龍尾硯在經歷了一段顛沛流離的時光之後，終於「歸雪交」，回到了黃宗羲的書齋之中，但硯雖仍在，然此段時日之中的世局治亂、所交存歿，已恍如隔世。

追述三硯之後，時間往後拉至順治 11 年（1654）。據〈黃黎洲先生年譜〉所記，此年黃宗羲把三女嫁給甬東（今浙江省舟山島）的朱沆<sup>16</sup>，行至半途卻傳來家中遭竊的消息，其中也包含了心愛的硯臺。最寵愛的兒子阿壽擔心黃宗羲過度傷心，當時還特地求得了一方硯臺給黃宗羲用。只是如今壽兒過世，硯亦不在手邊<sup>17</sup>，黃宗羲最珍視的人與物都已遠離自身多年，頗有寂寥之感。

此詩中直接以史筆喻硯，並旁引朋友、家國、親人等事，則此處之硯給人一種記憶傳承的感覺。透過硯，彷彿可以聯結起過往的史事，只是硯雖在，而人事已全非，徒增淒涼哀傷之氣氛。

## 2、〈史濱若惠洮石硯〉甲寅

古來硯石取不一，海外羌中恣求索。今人惟知端歛耳，聞見無乃太追窄。水巖活眼既難逢，龍尾羅紋亦間出；遂使頑石堆几案，僅與階礎相甲乙。猶之取士止科舉，號嗷雷同染萬筆。雞舞甕中九萬里，鼠穴乘車誇逐日。吾家詩祖黃魯直，好奇亟稱洮河石，既以上之蘇子瞻，復與晁張同拂拭。欲使蘇門之文章，大聲挾洮爭氣力。吾友臨洮舊使君，贈我一片寒山雲。金星雪浪魂暗驚，恍惚噴沫聲相聞。欲書元祐開皇極山谷贈文潛句，愧我健筆非蘇門。<sup>18</sup>

此詩作於順治 13 年（1654），黃宗羲時年六十五歲。此年「群盜滿山」<sup>19</sup>，故黃宗羲奉母命遷至餘姚縣（今浙江省餘姚市餘姚鎮）海濱第四門。詩題中的史濱若當為曾任職於臨洮（今甘肅省中部、洮河下游）之官吏，史氏送了一方洮州（今屬甘肅一帶）石硯給黃宗羲，黃宗羲因此聯想起亦曾贈洮州綠石硯給晁補之、張耒的黃庭堅，心有所感故作此詩。

此詩開頭先談論古代硯石的來源廣泛，舉凡海外、羌中皆可取材。藉此批評今人眼中唯有端硯、歛硯等名品，知識見聞過於狹隘。這樣的情況便如同當時的科舉

<sup>15</sup> 參《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 1 冊）》，頁 384-385。另外黃宗羲亦曾傷陸符之逝而作〈陸文虎先生墓誌銘〉，文中對陸符的生平經歷及和自身的交遊亦有相當詳細的說明。參〈陸文虎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頁 347-351。

<sup>16</sup> 參〈黃黎洲先生年譜〉。《黃宗羲全集（第 12 冊）》，頁 36。

<sup>17</sup> 詩作未交代硯臺的去向，其實後來黃宗羲曾尋回此硯，只是又轉贈給當時著名的學者呂留良。呂留良有〈友硯堂記〉，記錄了朋友送給他的六方硯臺，其中第一方「八角硯」，便是「餘姚黃太沖名宗羲所贈也」，其下更續道：「太沖詩云：『一研龍尾從西土，傳之朗三傳之我。燕臺瀕洞風塵中，留之文虎亦姑且。十年流轉歸雪交，治亂存亡淚堪把。』未幾失去，又十一年而復得之，遂以見贈。」引文見《呂晚村先生文集》，卷 6，頁 24 下。

<sup>18</sup> 《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268。

<sup>19</sup> 〈黃黎洲先生年譜〉。參《黃宗羲全集（第 12 冊）》，頁 36。

考試，是仕進的唯一途徑，舉世因而「號嗷雷同染萬筆」，爲了八股科舉汲汲營營，筆下所作之文章多是千篇一律，難見特色。

詩後半段轉至前代黃庭堅贈硯師友的聯想。黃庭堅對洮硯的評價相當高，除了曾經贈送給自己的老師蘇軾以外，還和同門的晁補之、張耒一同賞玩。似乎想要藉由幾方洮石碧硯，寫出盛世文章，顯揚蘇門之名望。此番心境可由其〈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無咎、文潛〉見其端倪：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傾九州。道山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冕旒。貝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此地要須無不有，紫皇訪問富春秋。晁無咎，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澆君胸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張文潛，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入思齊訪落詩。<sup>20</sup>

此詩特別的是採用了互文見義的修辭手法。說晁時就含有張，說張時也含有晁，即黃庭堅贈送給他們二人的禮品是完全一樣的，既有茶葉又有洮硯，希望和他們一起藉茶葉活心、藉洮硯潤筆，灌溉內心涵養、書寫天下時事。黃宗羲此詩中的「欲書元祐開皇極」便是引此詩之句。

黃宗羲稱黃庭堅爲「吾家詩祖」，除了是同宗之因，或許還含有對其志向抱負的欽佩。黃庭堅有晁補之和張耒能贈茶、硯互相鼓勵，黃宗羲自己也有「臨洮舊使君」史氏相贈「一片寒山雲」。黃宗羲好像由此硯感受到了當初黃庭堅對晁、張的慷慨陳辭，因而自己也「欲書元祐開皇極」。只是黃宗羲除了擔憂自身筆力不夠雄健，也知道時局已今非昔比，不像當初黃庭堅等人處於宋仁宗統治下的元祐盛世。自己的國家，已然滅亡。

此詩雖未如前首直接以史筆喻硯，然黃宗羲卻由黃庭堅的典故及詩句突顯出自身對時代的感懷及哀傷，儘管筆下的詩句永遠再也沒有機會紀錄皇極盛世，但依舊希望藉由寫下值此世代交替之際的自身感懷，爲歷史留下一段紀錄。

### 3、〈周公謹硯〉

弁陽片石出塘棲，餘墨猶然積水湄。一半已書亡宋事，更留一半寫今時。  
 贖水殘山字句饒，剡源人近共推敲。硯中斑駁遺民淚，井底千年尚未銷。  
 詩格清寒窮愈高，須知此硯著功勞。一時傳寫癸辛卷，不數從前丁卯橋。  
 奇物終非井內藏，還來發洩好文章。流傳到我真慚愧，不識可能繼弁陽？<sup>21</sup>

此四首詩作於康熙 17 年至康熙 18 年（1678-1679）之間，黃宗羲年歲在六十九至七十歲之間。此四首詩作其實可視同一組，因爲都同樣是由對周公謹硯的感發

<sup>20</sup> 黃庭堅：《山谷全集（冊 1）》（臺北：中華書局，1970 年 2 月，據仿宋刻本校刊），卷 6，頁十。

<sup>21</sup> 《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281。

觸動而來。詩題中的周公謹，即南宋末至元代間的名詞人周密，字公謹，號草窗，南宋末曾任官職。元朝統治中原以後，周密不願意師事異族，於是便在臨安隱居，著書記錄南宋的各種人、事、物。其中如《武林舊事》、《癸辛雜識》等，便是追記自身在前朝生活的所見所聞。黃宗羲不知如何由古井中得到周密所用過的硯，或許是因爲兩人同屬國喪異族之手的遺民，黃宗羲對於此硯有相當深刻的感懷。

第一首以「片石」喻硯，點出了發現周密古硯之處在浙江的小鎮塘棲（今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東北部，京杭運河兩岸）。此硯出土之際，尚餘墨於硯池之中，似乎表示此硯蘊含著家國淪落之痛，即便相隔日久，仍能清楚感受。黃宗羲在後兩句則以餘墨爲線，直接將周密和自身連結起來：周密曾用此硯盛墨，在元初寫下追憶前朝的種種文字，今硯上仍留餘墨，將轉由我來敘寫明代的史事，我與他兩人都將爲傳承前朝的歷史和文化盡一份心力！

第二首以國家的殘破帶來文人筆下的豐饒爲起，頗有「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sup>22</sup>的意蘊，次句則又帶出了另一個南宋遺民戴表元，寫出兩位遺民心理對前代的共同追憶。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自號剡源先生，有《剡源集》等作品傳世，亦有許多追懷前代的詩作，如〈感舊歌者〉：「牡丹紅豆豔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樽酒，無人知是李龜年」<sup>23</sup>用唐玄宗時著名歌唱家李龜年的典故<sup>24</sup>來描寫時代動盪的哀悽，頗爲生動感人。末兩句則又回到了硯本身，以硯中餘墨喻指遺民的血淚，則遺民彷彿以血淚和墨以書之，其苦心孤詣的創作恰似藉此硯躍然眼前，傳歷千年。

第三首點出詩作將在窮困之時更往清寒之境界邁進，「癸辛巷」用周密之典，《癸辛雜識·序》便提及「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則書名之「癸辛」正爲周氏舊時居住的地方<sup>25</sup>；「丁卯橋」則用唐末許渾的典故<sup>26</sup>。黃宗羲認爲遺民詩作清寒境界的塑造，其功該由硯而得，可見在黃宗羲心中硯對歷史文化的貢獻性。

第四首回到硯的發現來起興，黃宗羲認爲這樣具貢獻性的珍奇之物不會永藏於井內，將會流傳給他人繼續書寫，如今此硯由自己所獲，除了能傳承書寫之任務外，黃宗羲更進一步擔心自身無法承繼周密當初寫作的意圖和志趣。周密在《武林舊事·序》曾言：「初不省承平樂事爲難遇也！及時移物換、憂患飄零，追想昔由殆

<sup>22</sup> 詩句出自趙翼的〈題遺山詩〉，參趙翼著、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濟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卷33，頁1010。

<sup>23</sup> 戴表元：《剡源集（附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宜稼堂叢書本），卷第30，頁483。

<sup>24</sup> 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可謂表現出李龜年在安史之亂前後身分地位變化的佳作，正可牽引出對於亂前美好的懷念及亂後零落的無奈。參仇兆鰲：《杜詩詳註（五）》（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060-2061。

<sup>25</sup> 周密著；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頁1。

<sup>26</sup> 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丁卯集兩卷」下注：「唐郢州刺史丹陽許渾用晦撰。太和五年進士。案晁公武讀書志作太合六年進士。丁卯者，其所居之地有丁卯橋。」參氏著：《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卷19，頁540。

如夢寐而感慨係之矣！」<sup>27</sup>，這種對時局的感慨及對前朝的思念，可謂和黃宗羲如出一轍；而在《癸辛雜識·序》中，周密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偽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子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sup>28</sup>

此處所言著書之旨趣，亦不正有如黃宗羲希冀記錄自身體會經歷，以補史事的文化傳承要求？

黃宗羲在這四首詩中，連結了周密、戴表元等遺民的志向及作品，集中突顯了「硯」所能比附的歷史意義，並希望自身能承繼周密、戴表元等遺民的書寫情懷，為一代之史事留下紀錄。

#### 4、〈致姜定庵乞硯〉

束髮友天下，惻惻念沈陸沈眉生、陸文虎。晚得交定庵，春風被枯木。

定庵天下材，賤子煙霞束。因緣劉子門，共轉荀孟軸。

劉子有遺書，走蠹飽殘福。公從牛篋中，發之光焰矚。

開豁天地閉，妥貼孩兒哭。因師以及友，倡和諧絲竹。

不嫌余瑣碎，經理到饘粥。念余開九帙，蒲柳豈再綠。

散髮臥沙牀，已營張超谷。文章雪後蕉，聲名英落菊。

所餘惟凍肝，亦恐朽爛速。水銀洗腸胃，雲母蒸肌肉。

虞初有是言，未必真可續！定庵齋頭硯，仁涵而義浴。

明眼照古今，興不借鸚鵡。惠此下巫陽，將來作含玉。

治鳥焚舊巢，山靈出新沐。佳話留平生，非以媚幽獨。<sup>29</sup>

此詩題中的姜定庵，名希轍，定庵為其別號，為黃宗羲的同門學友。黃宗羲曾作〈姜定庵先生小傳〉，敘述姜氏的生平經歷及為人處世，對姜氏甚為推崇。<sup>30</sup>黃宗羲和姜定庵結交，緣於同門求學。後來兩人的恩師劉宗周去世，所留下的著作論述，幾乎淪為蠹蟲的飽腹之物。幸賴姜氏將其自書篋中整理而出，黃宗羲在此以誇張的比喻「開豁天地閉，妥貼孩兒哭」來凸顯姜氏整理先師遺著之功。

黃宗羲續言自己有時過於「瑣碎」，此或指兩人振興證人書院以後的內部行政事務。據〈黃黎洲先生年譜〉所記，他們一起在康熙 6 年（1667）、黃宗羲五十八

<sup>27</sup> 周密：《武林舊事》（臺北：廣文書局，1995 年），頁 1。

<sup>28</sup> 《癸辛雜識》，頁 1。

<sup>29</sup> 《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363。

<sup>30</sup> 如於〈姜定庵先生小傳〉起首便言「……豈真儒哉！憑虛而觀當世，吾友定庵先生其庶幾乎！」參〈姜定庵先生小傳〉。《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頁 623-627。



歲時復興當年劉宗周講學的證人書院：「子劉子講學於證人書院，正命以後，虛其席者二十餘年。9月，公與同門友江定庵希轍、張奠夫應鰲兩先生復為講會」<sup>31</sup>。然姜氏從不以為杵，常幫忙照著黃宗羲的建議去處理一些諸如饋粥等生活起居的細小事件，令黃宗羲十分欽佩及感動。黃宗羲接著用張楷典故<sup>32</sup>描寫自身的形象，認為自己已是「散髮臥沙牀」般疏懶隨性，逐漸嚮往閑居山谷的隱士生活。儘管黃宗羲仍對自身文章聲名有所堅持，不因外在環境的襲擊而有所更易，但卻也覺得自己已逐漸年老體衰。

如此看似非常的悲觀負面的形容，突然由「定庵齋頭硯」而有了很大的轉向。黃宗羲認為此硯涵仁具義，其石眼雖非端硯中之絕品鸚鵡眼，明亮程度毫不遜色，彷彿能將古今事物照得通徹透達。因此黃宗羲特此向姜氏求取此硯，希望能藉由此硯砥礪自身，進而「焚巢」「新沐」以得新生。其中的「山靈出新沐」一句，當是化用自《楚辭·漁父》中屈原所言「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之典故<sup>33</sup>。

黃宗羲此處用硯的描寫比喻雖較為簡短，但仍是將其擺在古今歷史傳承的一貫脈絡，由「明眼照古今」便可證之，因此仍透露出歷史紀錄的旨趣。更重要的是：此詩記錄了黃宗羲與姜定庵的情誼，更讚揚姜氏對師門學說發揚光大之功，隱然有文化傳承意義的推崇。

## （二）表露心志

黃宗羲此類詩作共計五首。詩作內容主要是藉由際遇和經歷的書寫，透顯出內心潛藏的情意和志向。現分述如下：

### 1、〈長夏〉

終日荒途隔往還，荷風斌媚溉心顏。硯因蠅集更番滌，筆為蜂巢次第閒。  
精騎羞為安性拙，狂歌中斷憶時艱。誰言草木難甘腐？尚以成螢恨欠頑。<sup>34</sup>

此詩作於順治三年（1646）、黃宗羲三十七歲之前。主要是描寫漫漫夏日中的心境及感發。全詩由道途荒蕪、阻人行路而起，桌前的硯因為蒼蠅持續匯集其上而需不斷地滌洗，毛筆亦因蜜蜂不斷地拈惹而閒置。面對屋裡屋外的困境，更添長夏的煩躁。「成螢」指的是古人對螢火蟲的錯誤理解，因為螢火蟲在夏季多就水草產卵，幼蟲入土化蛹，次年春變成蟲，古人便誤以為螢是由腐草本身變化而成。<sup>35</sup>

<sup>31</sup> 《黃宗羲全集（第12冊）》，頁41。

<sup>32</sup> 《太平廣記》：「張楷字公超，有道術，居華山谷中。能為五里霧，有玉訣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門如市，故云霧市。今華山有張超谷焉。」參李昉：《太平廣記（一）》（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0。

<sup>33</sup>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6月），頁277。

<sup>34</sup> 《黃宗羲全集（第11冊）》，頁218。

<sup>35</sup> 如《禮記·月令》：「季夏三月……腐草為螢……」便是一個實際的例子。參《十三經著疏—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頁318。

此詩看來雖只是一閑居之作，心情的煩悶亦無實際之指涉，但若以「荒途」、「時艱」等詞來參看，或可和外在大時代的環境連結起來。如順治元年（1645），黃宗羲在「聞京師失守」後，曾和友人「為召募義旅計」，卻因阮大鍼報復東林黨人和復社中人的行為所阻礙，只得「踉蹌歸浙東」；<sup>36</sup>順治二年（1645），清軍入揚州，大肆殺戮，即史所稱之「揚州十日」<sup>37</sup>，而黃宗羲此時於國事所提報的戰略皆不被採納；於家事則先父祠堂被「抽屋材為營火」，於公於私皆心有餘而力不足。<sup>38</sup>觀察此詩作中的硯，因為蒼蠅的緣故要不斷地滌洗，筆也因為蜜蜂的關係無法使用而閒置，則此時詩人被局勢困在家中而無能為力，不也像硯筆受制於蜂蠅而無法發揮作用？則此處的硯，便可與黃宗羲本身做連結，成為個人形象的投射。

### 2、〈答何令見訊〉 以下壬寅

五十棲遲一老生，殘書破硯日縱橫。深山雪合無人跡，終夜風來只虎聲。  
賣藥脩琴纔入市，談僧算客與同盟。豈期好事如明府，累向人前舉姓名？<sup>39</sup>

此詩作於康熙元年（1662）、黃宗羲五十三歲之時。主要是回覆拒絕一名任職公門的何姓人士的推舉。黃宗羲此詩開門見山便點出自己僅是一漂泊老叟，終日只有幾卷殘書和一方破硯相伴左右。所居地為僻處深遠之高山，四周常為白雪覆蓋而杳無人跡。平常深居簡出，只有要論賣藥品及修繕琴具的時候才會離家到入人的市集，平常身邊的朋友不是好談禪說玄的僧侶，便是卜卦論相的術士。黃宗羲希望能根據這些理由來壓低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地位及評價，以便於回絕。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前一年，即順治 18 年（1661）時，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明史案」，此案對當時江南士人造成嚴重的影響。<sup>40</sup>黃宗羲身處事件中心，再加上一刻深刻於心的亡國之痛，對清廷當局只有更加痛惡的心理。而此處用破硯於詩作中，和詩作整體來參看，除了可能是大案之後，用以保身的客氣謙辭之外，也生動地表現出慘案發生後身心大受打擊的形象。

### 3、〈書扇〉

筆枯硯燥墨寒灰，雪壓牆頭一月來。年少兒郎歌水調，春從紅拍暫時回。<sup>41</sup>

此詩當作於康熙 25 年（1686）至康熙 27 年（1688）間，雖無確切年份編繫，

<sup>36</sup> 關於黃宗羲在順治元年（1644）的活動，可參考〈黃梨洲先生年譜〉「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公三十五歲」條所記。參《黃宗羲全集（第 12 冊）》，頁 30-31。

<sup>37</sup> 參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編年（第一卷 順治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5 年 7 月），頁 71。

<sup>38</sup> 關於黃宗羲在順治二年（1645）的活動，可參〈黃梨洲先生年譜〉「二年乙酉，公三十六歲」條所記。參《黃宗羲全集（第 12 冊）》，頁 31-32。

<sup>39</sup> 《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245。

<sup>40</sup> 關於「明史案」，可參《清史編年（第 1 卷 順治朝）》，頁 599。

<sup>41</sup> 《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306。

但觀察〈黃梨洲先生年譜〉所記「二十五年丙寅，公七十七歲」一條：「督學王公顯庵揆考圖經，知忠端公故有祠，飭即鄉里官埭浦口老屋三楹，肖像存舊。王明府嵩伊委沈教諭辰令焯攝二月祀事，公有記。」<sup>42</sup>此中所言之「公有記」，當為緊接在此詩的下一首作品〈先忠端公祠堂落成王明府嵩伊命廣文沈令辰攝二月丁祭〉<sup>43</sup>，據此可以推測，此詩當作於康熙 25 年（1686）2 月以前，黃宗羲七十七歲之時。

此詩由「筆枯」、「硯燥」和「墨寒灰」三個室內物件意象為起，呼應室外冰雪覆蓋的天氣，則室內的寒冷乾燥似乎便是由於室外的冰雪滿天所引起，給人一種受制於外在大環境而使內在學養無法施展的聯想。

後兩句藉由少年的歌聲中筆鋒一轉，似乎在紅牙板敲奏出的〈水調歌〉聲中，暫且看到了春意盎然的景象。此似隱喻了黃宗羲的正面理想及堅持，儘管大雪滿天，但總有冬去春來的一天，只要堅持等待，或許便能盼到心目中的春天。此詩題作〈書扇〉，可能便是黃宗羲書寫在扇面上用以贈人或勉勵自身的話語。

此詩中的硯再次運用了殘損的形象，而這種殘損的形象亦總是和外在的天氣或是環境相連結，易使人聯想黃宗羲是運用硯的形象作為自身的投射，表達在大時代洪流中無能為力卻又始終堅持的志節。

#### 4、〈元旦洗硯〉以下辛未

且將故事盡消停，老嬾何能傍世情。一事旁人猶笑我，鑿開冰雪洗寒星。<sup>44</sup>

此詩作於康熙 30 年（1691）、黃宗羲八十一歲。主要是描寫在元旦之日洗硯的情況。全詩由暫且忘卻過往的經歷為起，黃宗羲認為：自己已經活了大半輩子，知道該怎樣應對進退、待人處世，並不需依靠世俗的情態或他人的眼光來過活。因此即便旁人訕笑甚至是指責諷刺，還是維持著自身的步調。就像元旦之日，冰天凍地，但為了保持硯本身的性質以及實際書寫所需，該洗硯時，便不需遲疑。

此詩之硯雖只用在詩題之中，然詩句中「寒星」實為硯之代稱。況且綜觀全詩內容，主要仍落在洗硯之上。進一步來看，作者洗硯是在暫停故事、不思世情、忽略訕笑及冰天雪地之中進行，這樣的滌淨模式便把外在環境的影響和自身區隔開來，持續堅持自己的理念，故仍讓人聯想到黃宗羲本身的操守執著。

#### 5、〈苦寒〉

陰寐殺陽節，海鶴滿秧田。大水犯窮秋，狂蛟吐餓涎。

冬春連旬雪，四面斷行纏。如何陰慘氣，凝結此乾坤？

老人翻舊曆，上下數十年。大水似戊辰，歸途滯幽燕。

<sup>42</sup> 〈黃梨洲先生年譜〉。同上註，頁 50-51。

<sup>43</sup> 同上註，頁 306-307。此中〈黃梨洲先生年譜〉所記為「沈教諭辰令焯」，黃宗羲詩題則作「沈令辰」，此中當有一者為誤，只是未見相關證據，故先存於此。

<sup>44</sup> 《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340。

大雪似辛巳，鉢分雁寺鐘。大寒似甲午，冰濤阻甬船。  
雖然云相似，實則加於前。梅蕊緘春信，頑雲屯敗氈。  
凍硯無好文，濁油無明煙。聞昔有鄒子，吹律破冰天。  
六丁鑿陽合，繞郭花蟬聯。<sup>45</sup>

此詩作於康熙 30 年至 31 年間（1691-1692）、黃宗羲八十二至八十三歲之時。全詩主要是在記寫冬季的奇寒無比。詩作的背景是陰慘的天氣長期籠罩，本該有農夫壯丁工作的耕田，也停滿了海鳥。因為「大水犯窮秋」，前一陣子才剛經歷了水患，洪水奔騰氾濫。水患過後，接著是冬季的雪患，阻斷一切行路。

黃宗羲進一步翻查舊日所記，發現自己在康熙 27 年（1688）也曾遇大水，那時回不了家被困在幽燕異鄉；崇禎 14 年（1641）則遇大雪，那時被困在寺中和旁人分食濃粥；順治 11 年（1654）曾遇冰天雪地，船因而不能航行而泊靠在岸，那一年，黃宗羲正要送三女入嫁甬東<sup>46</sup>。只是這次的情況好像比前幾次都要糟糕許多。面對自然的災害，人類實是無能為力。此時黃宗羲便將希望寄託在古時候神話傳說中的人物身上，期盼能有奇蹟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黃宗羲另外有一篇〈姚沉記〉，是紀錄餘姚一地嚴重水患的始末。此事發生在「庚午七月二十三夜」<sup>47</sup>，庚午時值康熙 29 年（1690），恰在此詩寫作的前一、二年，而文中亦記有：「五月間，余自姑蘇返，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為鶴，查之則鶴也。東浙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鸛鵒、天津之杜鵑乎？」<sup>48</sup>，此中的「大鳥滿田」當與詩句中的「海鶴滿秧田」相同。因此筆者認為，此詩可能是記寫當時水患過後的冬季所連鎖產生的災害。

此詩中的硯受冰雪所凍，置入全文脈絡中，似乎沒有特殊的意涵，只是在記敘苦寒天氣時附帶提之。然對照〈姚沉記〉，卻有值得注意之處：

今人于山崩之處，皆謂出蜃，蜃即蛟也。讀《水經》云：「蛇雉相構為蛟，出殼之日，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皆龍之屬。」《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解者以為卦影虛設，豈知山崩則水出皆黃，海溢則水上皆玄，玄黃夾雜，象皆實事也。有疑天豈無權，顧令孽龍肆毒至此？年來人心敗壞，通都窮谷，黃童白叟，無不以機械為事，閃屍鬼魅，不可方物。五行于智屬水，智既邪出，水亦橫行，一氣之感召，天亦不能如之何矣。人誠有鑒於此，

<sup>45</sup> 《黃宗羲全集（第 11 冊）》，頁 341。此外，筆者讀此詩時，始終覺得文意未斷而句已盡矣，然未有實際證據，故僅於此提出，暫時存疑。

<sup>46</sup> 參〈黃黎洲先生年譜〉。《黃宗羲全集（第 12 冊）》，頁 36。

<sup>47</sup> 〈姚沉記〉。《黃宗羲全集（第 10 冊）》，頁 140。

<sup>48</sup> 同上註，頁 141。

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sup>49</sup>

黃宗羲在此處由《水經》談起，連結解釋《易經》乾卦卦辭之義，更重要的是進一步認為天災肆虐是因為人心的敗壞，末尾更希望人以之為鑒，不管是卦象的風雨露雷，亦或是實際天氣的風雨露雷，都有告誡教化的意味存在。依此來看，則黃宗羲寫作此詩，可能由實際天災的紀錄隱喻對現實狀況的批判或教化意旨。依此脈絡回歸詩句中的「凍硯」來看，除了可能是黃宗羲自我形象的投射之外，亦可能是指涉許多檯面上的文人士子行為敗壞，其心已如被冰凍的硯臺，無法再流瀉出好文章。

### （三）純粹記事

黃宗羲此類詩作僅一首。詩作內容主要近似實錄，紀錄與友人之交遊：

#### 1、〈與徐昭法〉

人傳徐昭法，可聞不可見。我今上靈巖，鐘鼓集法眷。  
相看盡陳人，不參以時彥。徐子最後來，布袍巾幅絹。  
儲公覽拙文，珍重壓端硯。徐子翻讀之，喟然而稱善。  
謂是震川後，敘事無人薦。虞山加粉澤，可謂不善變。  
落此一瓣香，百年如覩面。出其論文書，並與他著撰。  
體裁既整齊，字句亦工鍊。夜坐天山堂，諸家評略徧。  
人言子寡言，子言如竹筧。乃知世知子，猶為子之羨。<sup>50</sup>

此詩雖無確切年份編繫，但觀察〈黃黎洲先生年譜〉所記「三年甲辰，公五十五歲」一條：

同弟晦木公暨高旦中上靈巖，宏繼起儲集文蓀符秉、徐昭法枋、周子潔、鄒文江、王雙白於天山堂，縱談七晝夜。公篋中有文數篇，昭法見之，嗟賞不已，謂此真震川也。<sup>51</sup>

則此詩當作於康熙3年（1664）、黃宗羲五十五歲之時。

全詩主要是在記敘自己和徐昭法之間的互動。徐昭法，名枋，別字俟齋，和黃宗羲摯友沈壽民、復社中人巢鳴盛並稱為「海內三遺民」<sup>52</sup>。當年江南被清兵占領後，本欲隨父親徐汧殉國，後在徐汧勸告下保存性命，餘生「託跡茅屋，伏處荒村中」<sup>53</sup>，過著「隱居終其身」<sup>54</sup>的日子。正因徐昭法是個深居簡出的隱逸高士，故

<sup>49</sup> 〈姚沉記〉。《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141。

<sup>50</sup> 〈黃梨洲先生年譜〉。《黃宗羲全集（第11冊）》，頁251。

<sup>51</sup> 《黃宗羲全集（第2冊）》，頁40。

<sup>52</sup> 徐珂：《清稗類鈔（十一）》（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6月），卷31 隱逸類，頁1。

<sup>53</sup> 《清稗類鈔（四八）》，卷92 飲食類，頁186。

<sup>54</sup> 《清稗類鈔（十一）》，卷31 隱逸類，頁1。

在此之前，黃宗羲很難有機會和徐昭法會面。然兩人同時身為心念故國的忠臣遺老，早已知悉對方名聲而心懷仰慕。兩人終於在黃宗羲「上靈巖」<sup>55</sup>的情況下會面，黃宗羲因而為詩記之。

此詩主軸在記述兩人之間的接觸，硯在此似無太大的特殊意涵。然而全詩卻揭示出黃宗羲和徐昭法難得的交流經過，以及黃宗羲對徐昭法的欽佩。除卻實際學養和操守等因素之外，應當也是黃宗羲心中念茲在茲的家國想望投射。

綜合以上三個部份來看，「感時傷世」中的作品皆以硯的傳獲始末為基礎，或論及黃宗羲的友人，或涉及歷史上的文人，呈現出與友人交遊的情況以及對史事的感懷。一則以小見大，由友朋零落殆盡顯露時局動盪；一則藉古觀今，或由前朝盛世感懷，或由國喪異族哀嘆。不管是當時友朋的描寫或是歷史文人的記述，又共同指向對當時史事的感懷及觀點。「表露心志」中的作品則多由硯的形象出發，或由殘損感嘆現實中殘酷的打擊；或由滌洗彰顯個人堅定的志向，兩者皆同樣指向黃宗羲的個人形象，而此形象的塑成，又常繫乎外在時局的影響，因此亦可連結上當時史事。「純粹記事」中的作品所出現的「硯」雖然僅是順道提及的物件，然詩作卻紀錄了黃宗羲與前朝遺民的交流，亦同樣流露出歷史感懷的情感投射。

### 三、以「硯」為喻之因

分析黃宗羲詩作中的「硯」後，進一步要說明何以選用「硯」這個物件表現的原因。文人和硯的關係可謂十分密切，「文人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之中最相親傍。」<sup>56</sup>，雖然文房四寶中尚有筆、墨、紙，然「硯與筆墨出處相近，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記，硯之壽以世計」<sup>57</sup>，硯和文人相處的時間最長，感情也最為深厚。除此之外，還可能和硯本身給人的想像和比附有所關聯。以下試分成「材質」、「功能」和「形制」三個層面<sup>58</sup>說明：

#### （一）材質

硯的材質來源相當豐富，其中最常見便是石質。在黃宗羲的詩作中所論及的硯便多屬此類。石之能成硯，本身需具備一定的條件。以下分「溫潤」和「縝密」兩

<sup>55</sup> 據《清稗類鈔（廿四）》卷 54 廉儉類「徐枋廉潔自好」條所記：「長洲徐枋為明遺老……卜居靈巖山……」，則此詩中的「靈巖」應為徐昭法隱居的「靈巖山」。參《清稗類鈔（廿四）》，卷 54 隱逸類，頁 10。

<sup>56</sup> 陳繼儒於《妮古錄》中語。參宋途、陸仁成編：《古玩寶典（一）》（四川：巴蜀書社，1994 年），卷二，頁 136。

<sup>57</sup> 高似孫《硯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49 冊，譜錄類，頁 100。

<sup>58</sup> 張元慶先生曾由「就硯石材質聯想」、「就硯臺功能聯想」和「就硯臺形制聯想」來敘述硯與士人之關係，這三項敘述放在「硯銘中的人硯情」的前提之下，「硯銘」指的是鑲刻在硯臺形體上的文字。筆者以為，張元慶先生的分類是由硯體本身為出發點，並佐以相關硯銘為證，與筆者之意不相衝突，故引用其概念於此。參張元慶：《古代士人與硯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頁 159-187。

個層面來概述：

### 1、溫潤

好的硯石多藏蘊於水中，如米芾《硯史》記端州（今廣東省肇慶市南部、西江左岸）巖石：「巖有四：下巖、上巖、半邊巖、後礫巖。余嘗至端，故得其說詳。下巖第一，穿洞深入，不論四時，皆為水浸」<sup>59</sup>，因終年浸淫水中，故具有溫潤的特性。此特質容易讓人將硯和玉連結起來，更進而容易聯想到君子的修養，溫文儒雅，使人樂意親近。

### 2、縝密

好硯材質除了如玉一般溫潤以外，更須堅實縝密，方能堅勁耐磨。此易讓人聯想到君子心思縝密具條理，有自我的堅守及把持，不輕易被外界影響的修養。這項修養又與史家必須秉筆直書、不受制外在條件的紀錄方式不謀而合。除此之外，縝密堅硬的材質適合世代流傳，也正如同史書傳遞世代紀錄的性質一般。

## （二）功能

硯的功能主要是用來磨墨及容墨。因此，磨墨處的「硯堂」及容墨處的「硯池」，便屬於硯的重要部位。以下試分成「磨墨」和「容墨」二個方面來概述：

### 1、磨墨

由於硯本身的質地堅韌，大多能承受日積月累的磨研而不易其形體。這使人聯想到有德君子面對外在的磨難，多能承而受之並不改其志。

### 2、容墨

硯的形制常有硯堂、硯池之分，硯堂光滑平整，以利磨墨；較為高起，使墨易於流入低窪凹陷的硯池。這易使人聯想到君子該謙沖寬容，豁達大度，方能成就自身的學問及事業。

書寫完畢之後，硯中常有餘墨。這時除非另有他用，否則為了維護硯本身的品質，通常會加以滌洗，回復硯的本來面貌。因此容易讓人聯想到君子的潔身自好，不願與俗同染污濁。即便一時遭遇困厄，也能對外在加諸而來的抹黑概括承受，潛心等待回復本來面貌的一天。

## （三）形制

硯的形制非方即圓，應是承襲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天之運行依序有常，籠

<sup>59</sup> 米芾《硯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49冊，譜錄類，頁66。

罩在四方大地上，而萬事萬物便生存在其間。因此硯非方即圓的形制，常令人和天地的運行接榫，使人以自然為師。落在實際的行為之上，便是要具有達觀圓融的智慧及眼光，並在處事上能剛直端正。進一步來看，史家書寫錄歷史的方式也可與此連結，一個好的史家必須具備圓融通貫的智慧，更需具有剛正不偏的取捨標準，如此所紀錄出來的史書方可實際傳達當時的景況，以便後人世代傳遞。

綜合以上來看，可知由硯本身的材質、功能和形制可以讓人產生君子形象的聯想，其中更有部份可以聯想到史家寫作的態度。由此而言，則黃宗羲選用「硯」來呈現似非隨意的偶然，實有其背後深刻的意義存在。

#### 四、「史筆」內涵詮釋

張高評先生雖以「硯」為「史筆」之化身，然而「史筆」意涵實指為何？卻未有進一步的說明。對於此項問題，我們可以進一步徵引黃宗羲的論述來試加考察：黃宗羲曾在〈姚江逸詩序〉中提到：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為表裏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義，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倣之為《明詩選》，處士纖芥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齊蓬戶於今閩，風雅袞鉞，蓋兼之矣。<sup>60</sup>

便有標舉「詩、史互證」的意味。黃宗羲自己的詩集名為《南雷詩曆》，便是希望在歷史時間軸上，以詩作為當時的事件及人物留下紀錄的座標。<sup>61</sup>

此外，還可以進一步看看黃宗羲在〈萬履安先生詩序〉的另一段話：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社，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

<sup>60</sup> 〈姚江逸詩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10-11。

<sup>61</sup> 陳旻志先生兼用「曆」和「歷」兩字來說明黃宗羲的《南雷詩曆》：「故言『詩曆』以年月為曆亦可，或謂『詩歷』，以詩為史，以生平之詩心縱覽興亡亦無妨。」可謂相當深刻而詩意的見解。參《殘霞與心焚的夜燈如舊——一代儒俠黃宗羲的「文道合一」論》，頁325。



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sup>62</sup>

此文引出「詩史」這個重要概念，詩史之說起於孟棻的《本事詩》：「杜逢祿山之亂，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sup>63</sup>，本專用以形容杜甫詩作。然在黃宗羲此段話裡，卻成為可以印證發明史事的詩歌創作意旨和特質。更有史籍所無法詳錄者，亦得由此類詩作補充代替，使當時之人事，得存於天壤之間。黃宗羲這樣的說法除了帶給「詩史」開拓性的意義之外，也為詩歌創作的藝術性注入了新的內容。<sup>64</sup>

由以上兩則引文可以發現：黃宗羲的詩歌創作觀其實是想結合詩與史，訴求詩史互證的作用，因此黃宗羲在創作詩歌時，大多也是循著歷史紀錄的方式來呈現。此點我們除了可以從其《南雷詩曆》的書名上獲知、亦可由其大部分詩作皆依年份序列編排了解，更可由上述分析的詩作內容中窺其端倪。

再結合詩作分析一節的內容來看，「史筆」的意涵可以分述成以下幾種詮解：

#### （一）記史

紀錄當時或前代發生過的事情。這些史事可能已經被記載在史籍之中。黃宗羲等於是透過詩作，再留下一些相關紀錄。如〈苦寒〉一詩，紀錄餘姚一地的雪害，屬於當時發生之史事；〈史濱若惠洮石硯〉一詩，紀錄黃庭堅送硯給蘇軾、晁補之、張耒的典故，屬於前代發生之史事。

#### （二）補史

補充史書不會紀錄的事情。這些史事大多著重於黃宗羲與友人的關係。文人交往的紀錄，即便紀錄於史籍之中，大多也僅止於介紹性質，欲知深入的交往，唯有透過當時與會者的詩文。就此而言，黃宗羲以詩歌留下了第一手記載。如〈與徐昭法〉一詩，便紀錄了與前朝遺民徐枋的結識經過，對於當時明遺民的交往關係可謂重要的紀錄。

#### （三）評史

對歷史事件或人物做出評斷，並寄寓自身的觀點。如〈周公謹硯〉一詩，黃宗

<sup>62</sup> 〈萬履安先生詩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49-50。

<sup>63</sup> 孟棻：《本事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集部第417冊，詩文評類，頁240。

<sup>64</sup> 黃宗羲對「詩史」觀念的拓展，其實蘊含了明代以後對「詩史」觀念的反省和改變。此前的「詩史」專指杜詩，此後則成為替代、補充、發明、印證歷史的一般詩作，並不專指杜詩而言。此中的變化歷程，可參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頁50-91。

義以周密、戴表元的遺民身份作為連結闡發，以宋元易代的沉痛心情投射自己身處的明清易代之感，並藉由對周密、戴表元的推崇表述對於史事的評斷和見解。

#### （四）喻史

將自己的身世置入歷史的脈絡中，藉由硯臺投射自身形象，表達自我選擇。如〈長夏〉一詩，藉由「硯因蠅集更番滌，筆為蜂巢次第閒」凸顯當時「終日荒途」的無奈。然而不管是怎麼樣的「時艱」，滌污去垢、堅守志節始終是黃宗羲永遠且唯一的選擇。

此四種角度不全是截然的劃分，有時會相互關聯。可以〈答何令見訊〉一詩為例：此詩乍看是黃宗羲紀錄當時與任職公門的何姓官員的交往經過，由於對方名字未明，官位也不大，史書應也無確切記載。從這角度來說，也算補充了史書。進一步來看，黃宗羲用「殘書破硯」來隱喻形象，表達「累向人前舉姓名」的選擇，除了可以說是自我的凸顯之外，也透露出對當時政府無法認同的觀念。而串起此種種聯想的關鍵，都由「硯」所牽引帶出。

概言之，在黃宗羲眼中，「一人之身而正變備焉者也」<sup>65</sup>，儘管單獨的個體在歷史洪流中似乎無可立足，然而藉由詩歌的創作，便可以從此個體與友人的交遊、對時事的感懷、理想的寄託中，了解時代背景如何深刻地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及思想，此其實便可以連結上黃宗羲「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sup>66</sup>的說法。因此，筆者以為就黃宗羲的詩歌創作觀和這些提及「硯」的詩作來看，其所蘊含的「史筆」主要應是在具有歷史紀錄的意義的基礎上，更希望能進而傳達一種價值評判的表述，除了可以和歷史相互印證之外，也能更進一步透顯出對當時局勢的觀點及看法，甚至表彰自身的志趣。

#### 四、結論

綜合以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黃宗羲詩作中的「硯」，呈現出一種紀錄、補充、評斷、寄寓真實史事的「史筆」意涵。由於硯在大多數文人心目中，具備內在溫潤、外在堅韌的玉石特質，而黃宗羲詩作中藉由硯所具備的史筆意涵，也同樣是希望在記錄發揚史事的前提下，進一步透顯出背後深藏的旨趣和評判。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黃宗羲更進一步在「史筆」的蘊含中，將自我形象投向在硯這個物件上，此當是由硯的功能性所產生的聯想，硯須耐磨容墨，不管是面對檯面上的墨條衝擊或是檯面下墨液滲透，始終都能堅持自身而不受改變，正如同黃宗羲儘管屢遭不順，然總是能堅守志節。

綜合來看，黃宗羲這些詩作其實是在歷史紀錄的大前提之下埋藏兩條支線：一

<sup>65</sup> 〈陳葦庵年伯詩序〉。《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49。

<sup>66</sup> 《南雷詩曆·題辭》。《黃宗羲全集（第11冊）》，頁204。

則藉由硯的獲得始末，紀錄了與友人交遊往來、對前代文人的推崇讚譽以及自身生活經歷；一則藉由硯的外在形象，表現出個人形象的投射，表現出大時代環境帶給詩人個體的影響，牽引出無可奈何卻又堅持死守的心理狀態。簡言之，黃宗羲這些述及「硯」的詩歌作品其實都隱含了「硯一人一史」的相連結構，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可以了解到黃宗羲個人心緒、與友人的交遊情誼、對歷史人物的觀點和看法，而這些都是以硯為基礎，而與外在時勢有著緊密的連結關係。因此，黃宗羲可說是藉由自己的詩歌創作，為當時的史事留下一些觀看角度和紀錄。

黃宗羲以文人書房的小物件硯出發，繫連記述了自身的交遊圈，更寄喻了個人形象投射及情感於其間，呈現了當下的時事紀錄，呈現出「史筆」豐富而多層面意涵。這些意涵都透顯出一種悲愴的心境，如因念及人事已非的今昔對比而可能心灰意冷、面對外在的磨難和打擊無能為力，只能冷靜面對。凡此種種，都使黃宗羲的此類詩作蒙上一層哀傷的冷色調，此或許正呼應了徐定寶先生以「冷」字來概括黃宗羲詩的評斷，則據此觀點而言，又是黃宗羲詩作不容忽視的獨創性特色<sup>67</sup>。

## 五、徵引書目

### (一) 傳統文獻

1. 【唐】孟棻：《本事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4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2. 【宋】米芾《硯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3. 【宋】李昉：《太平廣記（一）》，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文學古籍刊行社，1954 年。
5. 【宋】高似孫《硯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6. 【宋】黃庭堅：《山谷全集（冊 1）》，臺北：中華書局，1966 年，據仿宋刻本校刊。
7.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 年。

<sup>67</sup> 對於徐定寶先生對黃宗羲詩作風格的討論，可參《黃宗羲評傳》，頁 263-268。此外，張仲謀先生更進一步將「冷」和「澀」、「拗」、「硬」結合，一併用以形容浙派詩風：「浙派之冷、澀、拗、硬的詩風，不盡屬於詩歌美學範疇，而是浙派詩人心態、情感與人格精神的一種『有意謂的形式』。從黃宗羲、呂留良等遺民，到厲鶚、金農一輩人，他們對於現實政治的淡漠，對於滿清王朝的排拒心態，以及保持自我人格獨立的意識，都是形成此種詩風的潛在因素。或者也可以說，此種詩體與風格，正是他們的心態與人格的詩話形態」。此處將詩風特色回扣人格精神，人格特質投射在詩作上便呈現出特殊的詩風。此種說法恰和筆者討論「硯一人一史」的連結性若合符節。關於張仲謀先生對黃宗羲及浙派詩人的說法，詳參氏著：《清代文化與浙派詩》，頁 52。

8.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9. 【宋】周密：《武林舊事》，臺北：廣文書局，1995 年。
10. 【宋】周密著；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宋】戴表元：《剡源集（附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宜稼堂叢書本。
12. 【元】脫脫等撰：《宋史（十）》，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
13. 【清】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臺北：鐘鼎文化，1967 年。
14.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五）》，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5. 【清】趙翼著、華夫主編《趙翼詩編年全集》，濟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6. 【清】《十三經著疏—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17. 【清】徐珂：《清稗類鈔（十一、廿四、四八）》，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年。

## （二）近人論著

1.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編年（第 1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5 年 7 月。
2.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 年。
3. 吳光：《黃宗羲與明清思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4. 吳建偉：〈洮硯叢說補遺—黃宗羲詩《史濱若惠洮石硯》詮釋〉，《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三期，1999 年。
5. 宋途、陸仁成編：《古玩寶典（一）》，四川：巴蜀書社，1994 年。
6. 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 1、2、10、11、12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
7. 徐定寶：《黃宗羲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張元慶：《古代士人與硯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 年。
9. 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
10. 張高評：〈《南雷詩曆》與傳記詩學〉，《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十二卷第 2 期，1993 年 12 月。
11. 陳大川等著：《硯》，彰化：彰化社會教育館，1991 年。
12. 陳旻志：《殘霞與心焚的夜燈如舊—一代儒俠黃宗羲的「文道合一」論》，臺北：萬卷樓，2002 年。
13. 華建新：〈黃宗羲與化安山詩情—「山居詩」審美透視〉，《遠程教育雜誌》第六期，2000 年。

14. 趙自：〈達蓬山與黃宗羲的游詩〉，《文匯讀書周報》，2001。
15.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社，1988年。
16. 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

